

张廷昌 朱建平 编著

武威汉代医简研究



武威汉代医简研究

张延昌 朱建平 编著

原子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威汉代医简研究/张延昌、朱建平编著.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1996. 12

ISBN 7-5022-1649-9

I. 武… II. (1)张… (2)朱… III. 医古文：竹简文—研究—中国—汉代 IV. 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4504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于 1972 年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的研究概况作了简单介绍后，着重叙述了其在中医学、方剂学、中医药理论、临床治疗（含治疗方法）等方面的成绩和贡献。截止到目前为止，本书是在武威汉代医简研究工作中较为全面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作品。

读者对象：医史文献研究、中医药和考古工作者，以及有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等。

◎原子能出版社，1996

原子能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43 号 邮政编码：100037

河北省廊坊市光达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3.4 字数 58 千字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

定价：8 元

24/160

李 序

武威汉代医简，因其为1972年11月出土于甘肃武威柏树公社下五畦大队旱滩坡汉墓的92枚医药简牍，故名。该简牍出土后经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馆合作编成《武威汉代医简》一稿，初稿完成后，经由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文化组介绍到文物出版社。经审查认为该书稿尚不成熟，特由出版社派遣知医之赵希敏（太医院医官赵云卿之孙女，北京名医赵树屏之女）编审，持稿于1973年9月初来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前身），当时我任研究室主任，由于赵编审与我室赵璞珊教授从小熟识，加之我室当时的研究工作尚不很多，我们又深感简牍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当即表示愿意全力协助作进一步的考释与研究。我清楚记得，在9月2日至11月中旬的两个半月，我们研究室由我主持，有赵璞珊、蔡景峰、谢仲墨、马继兴共同参加，与出版社赵希敏逐条逐句进行有关问题的考释研究，讨论、查阅文献、寻找依据，再讨论，再查考，如此多次始觉满意。当考释研究即将完成之际，《文物》杂志编辑部特来向我们约稿，《中国建设》也向我们约稿，希望我们撰写论文向国际报道。

《武威汉代医简》一书中的“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

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一文，正是我们对该简牍考释研究基础上集体合作讨论撰写的。为此参加讨论者有李经纬、赵璞珊、蔡景峰、谢仲墨、马继兴，先后进行了多次讨论，并由赵璞珊执笔写了第一稿，再由蔡景峰写了第二稿，该文发表于《文物》1973年第12期上，国内外反响很大。该文后被作为《武威汉代医简》一书的组成部分，于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八开线装本与十六开缩印本。虽然我们对武威汉代医药简牍之考释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欣然赞赏文物出版社的意见，即署名仍尊重原书稿不变。这就是该书面世前一段鲜为读者所知的往事，特别是责任编辑赵希敏先生为该书出版所奉献之心血良多，我们每每回忆与她那段良好的合作，她那认真严谨的编辑作风，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得知她不幸过世，无不为之可惜。

关于武威汉代医简之研究，我们在1982年向中国中医研究院并呈报卫生部，申请科研成果，经组织同行专家评选推荐与审议。同年获得中国中医研究院科研成果一等奖，卫生部科研成果二等奖。

《武威汉代医简》正式出版后，颇得各界学者之关注，中医学界、医疗史界识其重要者，更多撰文阐其学习研究之心得，我们《中华医史杂志》常常收到读者、作者之来稿，虽然限于篇幅能够发表者不多，但20多年来国内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之论文已约有数十

篇之多。其内容包括编排次第考释、文字考释补正、药物使用炮制、临床治疗方术、膏摩针灸技术、护理调摄习俗等，无不给予或多或少之涉猎研究，使之比出版前之考释研究得到明显的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令我十分高兴与欣慰。特别令我为之庆贺的是甘肃武威学子张延昌与我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医史专家朱建平合作，在前人考释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综合，分析研究，深入探索，把武威汉代医药简牍之研究，推向新的水平。我衷心祝贺他们取得成功。1996年10月，他们将合作研究之结晶《武威汉代医简研究》一书之清样示我，并请我能为该新作写一序言，我欣然应允。但写些什么？经思之再三，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已往就我所知者，向读者作一些交待，或不无补益，或有一点新意。因为这段经历已是23年前的事，为了准确一些，我不但翻阅了有关资料、日记，还请共同参与者帮助回忆并翻阅了资料与日记，相信这段追忆是符合实际的。我衷心期望《武威汉代医简研究》能在新的基础上，唤起更多学子对其考释研究，不断取得更新更大的成果。

秦都 李经纬

1996年10月于中国医史博物馆

吴序

号称“羲皇故里”的甘肃，地处丝绸之路，历史悠久，文化昌明，就医学而言，莫高窟的“敦煌医学”，古凉州的“武威汉代医简”，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前者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时间研究这门大学问的，大有风起云涌之势，而刻意研精，著书立说、学有成就者终属凤毛麟角之士。比较而言，研究“武威汉代医简”的人就相对少一些。面对一种出土文物，要研究它，首先得有考古学的基本知识。说到考古，就不那么容易了，以“武威汉代医简”而言，它涉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医学、中药学、天文学、地理学、考据学诸多学科，谈何容易。清末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约十数万片有刻辞的甲骨，迄今已经96年了，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始作考释起，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学者考释研究了近一个世纪，才确识了一千多个字，所余超过三分之二的字，至今还不能确定为某字，研究甲骨文的“甲骨学”还是那么方兴未艾。可见对于出土文物研究之重要、艰辛与热衷了。

1972年11月，武威出土的92枚汉代医简，迄今已23年了。它虽然是汉代的医学简牍，不像殷商甲骨

刻辞那么古老，但作为一门学问——“武威汉代医简学”，自有它的广度、深度和难度，所以直至今日，除文物出版社1975年10月出版的由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馆编辑的《武威汉代医简》一书外，再未发现任何一本专题研究医简的专著。所见者只是一些从不同角度发表于杂志上的论文，诸如对简牍资料编排的考释、文字考释与补正、中药名称考释，以及药物炮制、临床应用、膏摩针灸、护理调摄等，既缺乏必要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又缺乏膺服的指导性与权威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为遗憾的事。

如今的甘肃，毕竟偏僻一些，落后一些，中医学界的力量也过于单薄一些，分散一些，远远比不上湖南对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文物《五十二病方》的研究。同样是汉代医学，同样是出土文物，同样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但对武威汉代医简的研究之重视程度，研究之规模，研究之成果，就逊色得多了。

武威人氏张延昌君，出于对故乡文化的热爱，出于对医学文化的弘扬，出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潜心考古，肆力研究，成果卓著，发表有关医简论文多篇，今与在医史文献研究诸方面颇有造诣的中国中医研究院朱建平先生携起手来，汲取汉代医简出土以来有关研究成果，融入自己的心得，编著成《武威汉代医简研究》一书，将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无疑是医学界的一件大喜事，“武威汉代医简学”

的一件大喜事。这本目前对武威汉代医简研究的集大成者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可指日而待也。

付梓之日，二君求写序文一篇，我，作为一位道地地道的陇右布衣，对西凉国文化虽毫无研究，但却顶礼膜拜。1973年春由古秦州天水调至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时，已谢世的良师益友尚坦之先生还在帮助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馆考释校正后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武威汉代医简》一书，对其内容，时有所闻；最近又由《甘肃科学学报》杂志编辑部送来了求审的张君写武威汉代医简研究的文献综述——“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后的研究现状”一文，总算一步一步对这门学问多少有点感性认识了。另外，又熟读了武威大学问家李鼎超先生的《陇右方言》，简直是爱不释手；1976年夏秋，在武威大河作过三个月的中草药调查，1978年秋在武威开中草药采种制用学术会议时，作过几次大型学术报告；还有很多武威朋友。所以，对武威有特别深厚的感情，知道武威是一个风水宝地，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当编著者请我写一篇序言时便欣然答应了。在甘肃武威这块宝地上，除了“飞马踏燕”的铜奔马、西夏碑外，还有另一件瑰宝——价值非凡的汉代医简。有关部门应该组织力量，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通过几年的努力，拿出对得起古人、今人、后人的成果。张、朱二君从事业出发，编著了这本书，真是一件可喜可贺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故愿为

作序。

陇右布衣大白吴正中一九九六年四月十日
于甘肃中医学院稼穡斋

前　　言

武威，古称凉州，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1972年11月，武威柏树公社下五畦大队旱滩坡地带兴修水利时，在一座东汉土圹墓中发现了一批医药简牍，计92枚。这些医药简牍的出土，不仅是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研究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的医学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多年来，很多学者对原简牍资料的编排考释、文字补正、药物炮制、临床治疗、膏摩针灸、护理调摄等方面作了研究，指出部分简牍内容对临床仍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经查阅近20多年来的图书资料，除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合编的资料书——《武威汉代医简》之外，再未发现专题研究这些医简的专著。为了发掘祖国医学宝库，弘扬祖国医学，使古老的中国医药学能继续为人民的保健事业做出贡献。本书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并汲取最近20年来有关武威汉代医简研究的成果，编撰成书，名为《武威汉代医简研究》。本书的出版，可供有关研究人员、中医工作者、中医文献工作者、考古工作者等参考。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热情支

持和帮助，特别是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前所长、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著名医史学家李经纬研究员和甘肃中医学院医古文教授吴正中的热忱支持和关心，并为之赐序；出版前，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献学会主任委员、著名中医文献学家马继兴研究员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在这里，还要感谢所有我们曾从其中获取营养的论著和作者。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讹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一九九六年十月

目 次

第一部分 总论

- 一 武威汉代医简出土经过及年代推算 (1)
- 二 武威汉代医简研究简况 (4)
- 三 武威汉代医简出土的意义和医学价值 (9)

第二部分 各论

- 四 武威汉代医简注解 (14)
- 五 武威汉代医简的药学成就 (45)
- 六 武威汉代医简关于方剂学和
治疗原则的成就 (51)
- 七 武威汉代医简对中医药理论的贡献 (61)
- 八 武威汉代医简对中医临床各科的贡献 (66)
- 九 武威汉代医简中的治疗方法 (80)
- 十 武威汉代医简的其他价值 (96)

第一部分 总 论

一 武威汉代医简出土经过及年代推算

武威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部，历史悠久，建置较早，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着。相传古代中国曾分为九州，今武威地属雍州。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开辟河西，武威以汉军军威到达河西故名。西汉时称姑臧，东汉时因武威郡迁姑臧后改称武威。东晋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南凉、北凉曾先后建都于武威。随后的北魏、北周、隋、唐、北宋、元、明、清、民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均在武威设置要府。武威又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历史上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商业流通，贸易活跃，因此在这块土地上有很多文物古迹、历史遗产。

1972年11月甘肃省武威县柏树公社下五畦大队在旱滩坡兴修水利工程时，发现一处汉墓。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保护下，由武威县文化馆、甘肃省博物馆对该墓进行了清理。这些被清理的资料，后来经过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编为《武威汉代医简》一书（以下称《医简》），1975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中内容包括“武威汉代医简图版”、“武威汉代医简摹本、释文、注释”等内容。

据当时清理汉墓的考古学家考察，旱滩坡地处祁

连山麓，距武威县城约 20 华里，为冲积的黄土山坡地，由西向东倾斜，并因山洪的多次冲刷，形成几条东西向的山沟。这座埋藏有成批医简的东汉土圹墓，即位于坡地东部一条山沟西岸的高处。在这一带山坡和台地上，保留着许多汉代墓葬。1957 年和 1958 年、1973 年先后在这一带发掘了 40 余座汉代墓葬，其中出土有竹、木简，织绵草筐，彩绘木俑，大型的木质轺车，完整的占卜式盘，丝麻铭旌，绚丽多样的绢帛丝织物，彩绘漆器，以及木斗、铜撮、竹尺等较珍贵的文物。

该墓室结构系土洞单室，墓门前有斜坡墓道，墓门方向北偏东 60°，墓室东西长 3.4 米，南北宽 1.25 米，高 1.1 米；墓门高 1.0 米、宽 0.72 米、深 0.60 米。墓门和墓室都是平顶，墓门用大砾石封砌。墓室底部距现地表深约 4 米。墓室内东西向置一柏木棺。木棺齐头齐尾，前、后高宽度大致相等，棺板合缝全用木榫卯合。棺内仰卧一男尸，仅存骨架，随葬器物出土的位置被移动。据了解，有木质鸠杖一件竖立于棺前，鸠鸟喙略残，作蹲伏状，张口含食。杖已残损，径不及 3 厘米，残长约 1 米左右。另有陶质的壶、仓、井、灶、盘共七件，分别置于棺首两侧。棺内有五铢钱五枚，料珠二枚。尸体头顶有一个麻质囊袋，袋内包木质简牍一束。由于尸体腐烂，致使部分简朽蚀残断或简文漫漶，经整理现存简牍共 92 枚（片）。考古

学家们在整理这些简牍时所见，原简册已散乱，各简上也没有编号标志，以致原册编联的先后次序几无可寻之迹。经过清理，92枚简牍中，简78枚，牍14枚。简系松木和杨木所制，简长一般为23~23.4厘米，简宽为1厘米和0.5厘米两种规格，1厘米者41枚（第一类简），0.5厘米者37枚（第二类简），简文系单行墨书，每行20~40字不等，字体为隶书兼草；牍14枚，均系松木所制，略残损，字迹部分模糊不清，牍长22.7~23.9厘米，厚度为0.2~0.6厘米不等，牍文也是墨书，正反两面书写，每面行数不等，一般为两行，但亦有多达六行者。其中，仅有二牍为单面书写，另有一牍为单行书写，字体也是隶书兼草。

关于武威旱滩坡汉墓的年代，由于未发现载有明确年号的出土物，其绝对年代无法判定。根据考古学家分析，这些医简与1959年在武威磨咀子清理的第六号东汉墓及其他31座东汉墓相比，有许多相同之处。如第六号墓墓室结构为土洞单室墓，分为墓道、墓门、门道和墓室四个部分，墓室成长方形，墓门用大砾石封闭，木棺为柏木，长方形，用细腰接缝，木椁合盖，不用铁钉。医简墓的墓室和木棺形制与之完全相同。

医简墓随葬的陶壶、陶仓与六号墓的同类器物很相似，鸠杖与磨咀子31座东汉墓出土的13件鸠杖亦是一样的。

医简墓出土的五枚五铢钱，根据《洛阳烧饼汉墓》对钱币的分期断代，有一部分具有汉代五铢钱第三期即东汉早期的特征。也有一部分接近汉代第二期西汉末年五铢钱的特征，朱字头成方折。但墓中没有出土具有东汉后期特征的钱币。

根据以上有关墓室、随葬品以及钱币等的特征，初步推测武威医简是属于东汉早期的墓葬。大约在光武或稍后的明、章帝时期，即公元25～88年，距今约1900余年。

从医简本身内容来寻求其成书年代的标志，有的研究者作了有益的探索。《中华医史杂志》1988年第2期载王辉文，指出医简中“痺”即为“癃”，而“癃”则为淋之古称，皆指小便不通。东汉殇帝（公元106年）名隆，为避帝之名讳，乃将“癃”改称为“淋”。武威汉代医简中称“淋”者只有一处，其余六处均称“痺”。由此可见，医简抄写年代下限在殇帝之前，即不会迟于公元106年。

总之，武威汉代医简的成书年代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参见《文物》1973年第12期“武威旱滩坡汉墓发掘简报”）

二 武威汉代医简研究简况

在我国考古发掘工作中，曾多次出土了战国至魏、晋时期的竹简、木牍，其中与医药有关的不到十